

第三章 合浦南越国遗存的辨识

合浦发现的汉代遗存较多，研究工作也比较深入，但是长期未能确认相当于南越国时期的西汉前期遗存。在近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合浦地区的西汉前期遗存逐渐显露出线索。本章根据前述对岭南地区南越国遗存的认知，结合合浦汉代遗存的既往研究，辨识出一批南越国时期遗存，以此作为开展南越国政权治下合浦地区整体社会面貌研究的基础材料。

一、合浦汉代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合浦汉墓的考古发掘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随着大量城市基础建设的开展，抢救性发掘的汉墓也逐渐增多（图 3-1），汉代城址的主动性发掘则始于 2002 年。据统计，迄今合浦已发掘墓葬 1200 余座，其中以汉墓居多，也有少量为三国墓、晋墓和南朝墓。相关的汉代城址，目前发现了大浪城址和草鞋村汉城址两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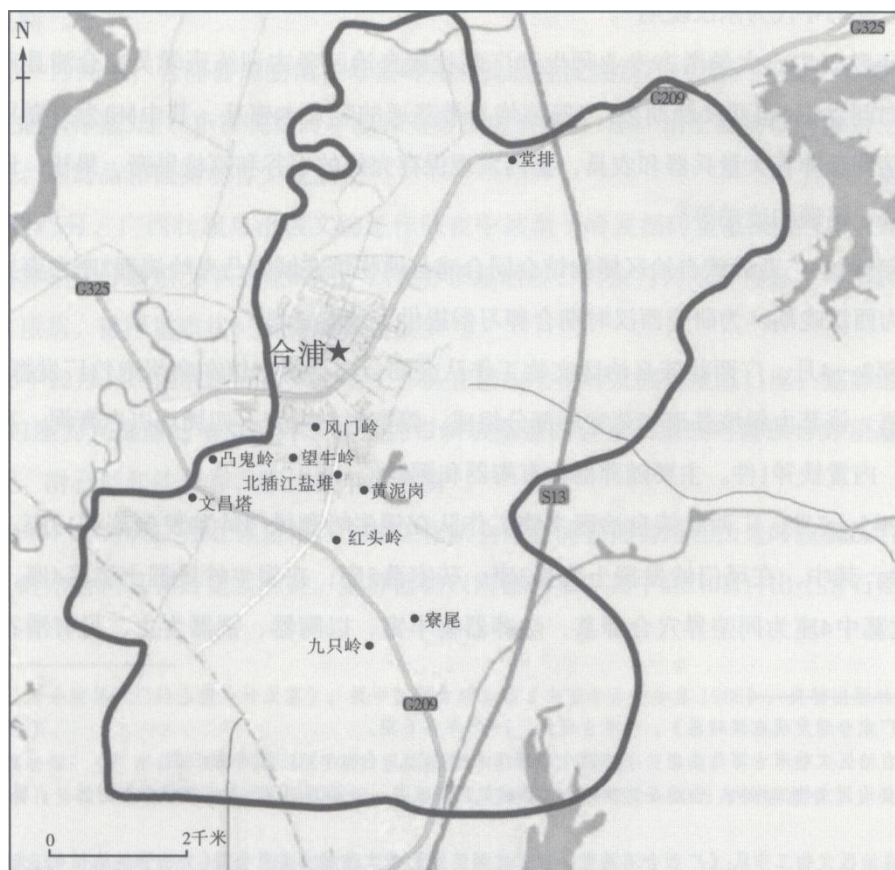


图 3-1 合浦县城周边汉墓发掘位置示意图

(一) 历年墓葬发掘

1957 年 4 月，广东考古工作者（当时合浦属广东省管辖）在杨家岭和廉东钟屋各清理砖室墓 1 座。这两座墓葬形制相似，均由斜坡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其中杨家

岭墓出土陶罐、陶壶、银戒指和铁匕首；廉东钟屋墓出土陶盂、陶屋、棺钉、五铢和半两铜钱等^[1]。

1971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位于合浦县城东南郊望牛岭的县炮竹厂发掘1座木椁墓，该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其中甬道两侧带耳室。随葬器物共245件，以铜器居多，还有陶器、铁器、漆器、玉石器、琉璃器和金器等。从墓中出土的铜风灯、金饼、珠饰品等珍贵器物以及有“九真府”墨迹的陶提筒等推测，墓主可能是西汉晚期位于现越南境内的九真郡高级官员^[2]。

1972年3月，在合浦廉州炮竹厂第一仓库发掘1座砖室墓，该墓由墓道、前室、中室和后室四部分组成，前室为横券顶，中室为穹窿顶，后室为直券顶，中室两边还有侧室。出土一批陶器和铜器，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3]。

1975年秋，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古训练班学员在合浦县环城公社堂排至埇口间发掘4座西汉晚期墓。4座墓均是带墓道的竖穴木椁墓，其中M2为夫妻异穴合葬墓。这批墓葬随葬有大量兵器和农具，墓内发现保存完好的稻谷和荔枝果壳、果核，还出土胡人俑、琉璃、玛瑙和琥珀等^[4]。

1984年9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城南凸鬼岭清理2座夫妻异穴合葬墓，年代为西汉晚期，为研究西汉时期合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5]。

1985年3-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廉州炮竹厂发掘1座西汉晚期木椁墓。该墓由斜坡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椁室封护考究，四周填以白膏泥。墓道底端有外藏椁，内置铁斧1件。主要随葬器物有陶器和铜器^[6]。

1985年5-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望牛岭和风门岭共发掘墓葬13座，出土器物300余件。其中，在风门岭发掘土坑墓3座，砖室墓5座；在望牛岭发掘土坑墓4座，砖室墓1座。土坑墓中4座为同茔异穴合葬墓，随葬器物丰富，以陶器、铜器为主，另有滑石器和铁器。砖室墓多被盗扰，所剩器物不多^[7]。

1986年4月，合浦县博物馆在风门岭第二麻纺厂发掘古墓10多座，其中M10保存较完整。M10为穹窿顶合券顶砖室墓，由墓道、前室和两个后室四部分组成，其中前室为穹窿顶，后室为直券顶。东后室放置陶器和铜器，西后室安放棺木。该墓出土的金银器、珠饰品和成套的葬玉制作精美。报告将该墓葬年代定为东汉早期^[8]。但也有学者认为应晚至东汉晚期^[9]。

1987年3月至1988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县城东南的文昌塔发掘古墓227座，年代为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有土坑墓和砖室墓两大类，其中以竖穴土坑墓居多，有无墓道和带墓道两种；砖室墓多被盗扰。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和铜器，还有少量铁器、玉石器、珠饰品等^[10]。

1991年7-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合浦县城南部的母猪岭发掘6座东

汉时期的砖室墓，墓葬可辨出为东汉早、晚两期。其中 M6 为砖圹墓，其余墓葬为直券顶墓。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另有铜器、金银器、石器和珠饰品。发掘报告认为 M1 和 M6 应属东汉早期，其余属东汉晚期^[11]。

1990-1996 年，合浦县博物馆在母猪岭先后抢救性发掘墓葬 10 座，报告发表其中 5 座，包括西汉晚期木椁墓 3 座、东汉晚期砖圹墓和直券顶砖室墓各 1 座。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铜器次之，铁器、珠饰品和银器也有少量发现^[12]。

1995 年 5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中站盘子岭发掘砖室墓 38 座（其中 1 座为合葬墓），墓葬年代分属东汉早、晚两期。以直券顶墓居多，其余为砖木合构墓、穹窿顶合券顶墓和双穹窿顶墓。被严重盗扰，所剩随葬品很少^[13]。

1996 年 12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禁山七星岭发掘砖室墓 11 座，墓葬遭受较严重破坏。除 1 座为无墓道的单室墓外，其余为带斜坡墓道的直券顶墓或穹窿顶合券顶墓。出土陶器、铜器、滑石器和铁器等，年代为东汉晚期^[14]。

1999 年 4-5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凸鬼岭发掘汉墓 17 座，有土坑墓、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三类。随葬器物以陶器居多，其中 M6 和 M11 出土滑石器较多。墓葬年代分属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晚期^[15]。

2001 年 7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九只岭发掘墓葬 6 座，其中 5 座为东汉墓。有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两类，出土器物以陶器和铜器为主，还有金花球、琉璃珠、琥珀珠、玛瑙珠等饰品。这次发掘填补了合浦汉墓形制上的一些空白，为建立可靠的东汉前、后两期断代标尺提供了材料^[16]。

2003 年 11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罗屋村发掘砖室墓 6 座，该墓地被盗扰严重，随葬品多已无存。报告认为这些墓葬的年代多为东汉晚期，部分也可能晚至三国时期^[17]。

2003 年底至 2005 年初，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凤门岭发掘汉墓 8 座，包括木椁墓和砖室墓。出土陶器、铜器、滑石器、金银器、铁器、珠饰等一大批珍贵文物。年代跨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晚期 4 期^[18]。

2005 年 8-9 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文昌塔发掘汉墓 8 座，其中 6 座属西汉晚期，2 座分属东汉早、晚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较以往的发现更具地域特点，为该墓地分期以及了解合浦汉墓的区域特征提供了重要资料^[19]。

2005-2009 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在禁山、凤门岭、炮竹厂、凸鬼岭、杨家山等地陆续开展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古墓 56 座，年代从西汉晚期至南朝，其中以汉墓居多。汉墓有木椁墓、砖木合构墓、砖室墓三类，砖室墓又分直券顶、横直券顶、穹窿顶、穹窿顶合券顶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另有铜器、铁器、银器、玉石器及琉璃、玛瑙、琥珀、水晶等珠饰^[20]。

2008-2009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还在寮尾墓地发掘古墓32座，其中东汉晚期墓7座，三国墓25座。汉墓有砖圜墓和砖室墓两类，砖室墓有直券顶墓、横直券顶合穹窿顶墓和横直券顶墓3种。出土了青绿釉陶壶、铜钹、胡人俑、焊珠金饰片、钠钙玻璃、蚀刻玛瑙珠等较多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器物。本次发掘为东汉晚期墓葬向三国墓的分期演变、年代发展序列提供了清晰的分期标准^[21]。

2009-2013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在合浦的杨家山、禁山官塘岭、汽齿厂、第二炮竹厂、廉州乳品厂、精神病院、电厂、迎宾大道、罗屋村、沿海铁路合浦段、中站李屋村、森林公园、南方机械厂、中站庞屋队、火车站等15处地点陆续发掘古墓157座，年代为西汉晚期至晋代。其中汉墓62座，有土坑墓、木椁墓和砖室墓三类，主要为砖室墓^[22]。

2012年6-9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对位于大浪城址北面700米处编号为D2的土墩墓进行发掘（图3-2）。D2为一墩多墓结构，在其内发现3座长方形熟土坑墓。随葬器物有陶甗、陶杯、陶瓮，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2003年试掘的D1，亦应为土墩墓。从出土器物判断，D1的年代略晚，应为西汉中期^[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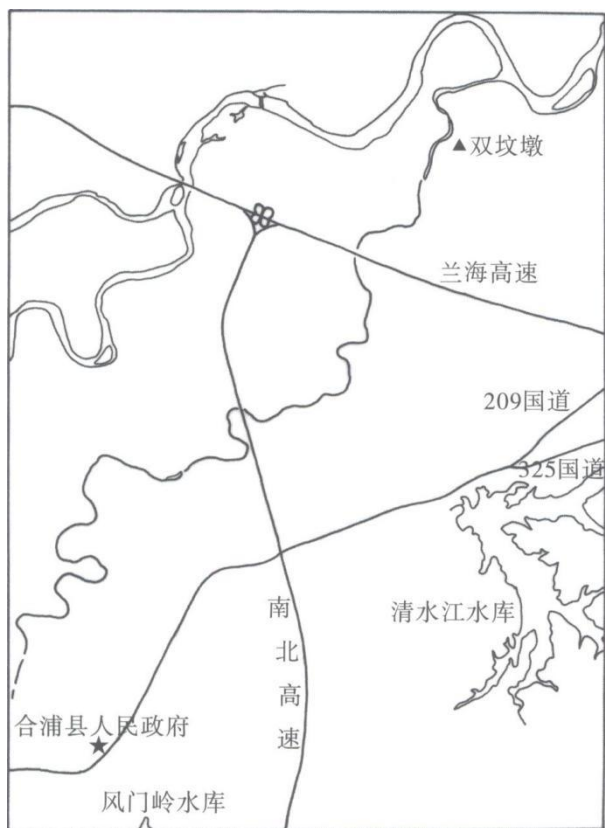


图3-2 双坟墩地理位置示意图

除以上发表的报告外，合浦县还馆藏有1977-1995年抢救性发掘的95座汉墓资料。此外，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也保存有部分发掘于20世纪80年代的墓葬资料。

（二）既往墓葬研究

近年来，随着合浦汉墓发掘数量的不断增多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持续升温，学者对合浦汉墓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涉及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基础性研究

主要为历年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涉及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的类型划分以及墓葬年代的分期研究。广西汉墓的分期划分标准多参照广州汉墓。20世纪50-60年代发掘的广州汉墓，其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丰富，主要器物的演变规律清晰，年代序列完整，可清晰地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晚期5期^[24]。依此划分标准，合浦现已建立起相对清晰的分期标准，为与中原及岭北其他地区统一起见，可分为秦代—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新莽时期、东汉早期和东汉中期等5期^[25]。此外，近年来对合浦汉墓的基础性综合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内容涉及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年代分期、区域特征、社会文化生活等^[26]。

2. 出土器物研究

合浦汉墓出土器物以陶器居多，铜器次之，最少为铁器、金银器、玉石器和各类珠饰品等。有关陶器的研究主要是对鼎、盒、壶、钫等仿铜陶礼器和井、仓、灶、屋等模型明器的研究，将其置于广西乃至岭南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研究，如朱海仁收集广州、番禺、徐闻、韶关、贵港、合浦、梧州及桂北地区等地汉墓出土的仿铜陶礼器，考察其发生演变过程，指出仿铜陶礼器在岭南西汉早期繁盛，西汉中后期、东汉前期开始弱化演变，到东汉后期已全面淡化。这一过程是中原礼制文化在岭南的推行历史，从侧面反映了周秦礼制的逐步淡化和大一统汉文化的逐步形成^[27]。李世佳对广西汉墓出土的陶井进行型式分析，并与中原及相邻的广东、湖南等地所出同期器物进行对比研究，论证得出广西汉代陶井形制和纹饰均颇具岭南特色，与广东汉代陶井更为相似^[28]。曹劲对岭南地区考古发现的建筑遗迹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初步建立了史前至两汉期间岭南早期建筑起源和发展的框架^[29]。冯远在博士论文中对岭南地区陶制建筑

明器进行系统梳理，理清该地区建筑明器的发展规律和阶段特点，与邻近地区的对比，讨论其结构特点和建筑布局的演变，以期复原岭南地区汉代建筑^[30]。

出土的铜器也有一些专门研究，如蒋廷瑜对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的种类、制作工艺、时代和制作中心进行分析论述，选取的器物多出自合浦，文章指出该类铜器繁盛期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在岭南地区出现较早，流行时间长，数量、种类多，广西的合浦、贵港、梧州应是其制作中心和主要产地，拥有者应为当时的官僚贵族^[31]。熊昭明对合浦汉墓出土的铜井、铜仓、铜灶组合进行研究，通过与北方地区同期出现的同类器物进行对比，研究得出合浦所出该类器物是仿自北方的陶器，为本地制作，推测为

临时定制。梧州等地发现的该类器物很可能也是从合浦输入的。出土铜井、铜仓、铜灶的墓葬，其墓主身份地位较高，体现了汉代厚葬之风^[32]。富霞将合浦历年出土的汉代铜器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初步分析各类器物的演变规律，并将合浦出土的铜器同海南、徐闻、越南北部等北部湾其他地区的同类铜器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其地域特点和发展特征。从器型、风格和制作技术来看，合浦汉墓出土铜器应多是本地铸造^[33]。

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如玻璃、石榴子石、琥珀、肉红石髓、玛瑙、蚀刻石髓珠、水晶、绿柱石、黄金等饰品及波斯陶壶、铜钹和胡人俑座灯等，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尤其是玻璃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家瑶、史美光、黄启善、干福熹、王俊新、李青会、王伟昭^[34]等学者的研究均涉及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器，包括探讨其形制、成分特征和来源等。2010年，熊昭明和李青会对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器开展考古学和科技综合研究，其中大部分标本来自合浦。通过与周边地区及东南亚、南亚和地中海地区出土的同期玻璃器进行比较，分析其制作技术和源流。研究表明，合浦出土的玻璃器主要为本地自制，还有部分来自东南亚、印度和罗马等地，初步厘清了合浦出土玻璃器的源流^[35]。

陈洪波对南海沿岸汉墓出土的金花球等饰品进行制作工艺、年代及来源研究，认为合浦金珠饰品体现出域外风格，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的关系，也有在合浦当地制作的可能性^[36]。黄珊等运用考古类型学和科技分析方法对寮尾M13B出土的青绿釉陶壶进行综合研究，指出这件器物应是来自伊拉克南部和伊朗西南部地区的舶来品，作为随身日常用品通过海路来到合浦，其主人有可能来自西亚^[37]。熊昭明对寮尾M13B出土的乐器铜钹的定名、纹饰和来源做了探讨，指出该器物具有强烈的中亚文化色彩，极有可能是从安息一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合浦的^[38]，并对合浦汉墓出土的舶来珠饰品做了系统研究^[39]。

其他器物如灯具、玉器等也有文章涉及。如熊昭明对广西出土的汉代灯具进行分类研究，认为合浦是广西灯具的主要出土地之一，是在中原汉文化、楚文化等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在接受内地传入的同时，岭南越人又创造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灯具文化^[40]。熊昭明、谢日万对广西出土的先秦两汉玉器进行系统研究，其中涉及合浦望牛岭、堂排、凤门岭、黄泥岗等地出土的玉璧、玉带钩、玉碗及一些葬玉类器物。文章指出广西出土的汉代玉器原料应为外地输入，其形制受中原文化影响最大，其次还受到岭北紧邻的楚文化以及周边广东石峡文化和云南滇文化的影响^[41]。

合浦堂排M1出土的“劳邑执刼”琥珀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黄展岳认为“劳邑执刼”琥珀印与海南岛乐东出土的“朱庐执刼”银印和南越国后期自铸官印基本相符，推测两印或是南越国用楚官执刼名号赐封居南越的楚国后人^[42]。郑君雷对海南“朱

庐执刼”银印和合浦堂排 M1 出土的“劳邑执刼”琥珀印的年代和性质做了分析，指出出土“劳邑执刼”琥珀印的合浦堂排 M1 墓主应当是南越国封拜的越人部族首领，入汉后仍为地方豪强。文章同时还对合浦望牛岭 M1 的墓主身份做了推测，从出土的“庸母(?)印”琥珀印判断，其墓主身份除九真郡太守外，还有流徙罪人的可能，“庸母印”或应读为“毋庸印”，墓主或为西汉晚期流徙合浦的毋庸家族人士^[43]。

3. 埋葬习俗研究

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合浦丰富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成为研究丧葬习俗的重要材料，相关论著主要涉及合葬墓、厚葬、外藏椁及架棺葬、碎物葬等内容。

汉代是夫妻合葬墓的重要发展和转型时期，合浦两汉时期墓葬均有发现。蒋廷瑜指出岭南地区的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出现于西汉早期，西汉中期开始流行，盛行于西汉晚期。同坟异穴合葬墓的使用，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长期采用木椁相关，它是同坟同穴合葬墓的变体或旁枝，虽是一种地域性的葬式，但并没有形成本地的特殊葬俗，不能把它作为特有的民族习俗来看待。岭南地区自东汉前期起盛行小砖券墓，由于砖比木材坚固耐久，同穴合葬一般不成问题，同坟异穴合葬就自然地消失了^[44]。

林强将岭南汉代夫妻合葬墓分为同坟异穴和同坟同穴两个类型，认为其演变发展是同时的，但东汉时期同坟异穴合葬墓已明显减少，还认为岭南地区的合葬墓具有本地特点，在形制和发展演变方面与中原地区有较明显的差异^[45]。他还探析了广西汉代厚葬习俗，指出西汉时期有大型棺椁墓和中型棺椁墓两种厚葬方式，为上层统治阶级、贵族所采用，东汉时期多为中型砖室墓，随葬品明显减少。林强认为，影响厚葬习俗产生的主要因素有精神信仰、儒家思想和经济发展^[46]。

另外，合浦一些大中型墓葬的墓道底端或一侧带有外藏椁。谢广维对广西汉墓外藏椁的发展演变及所反映出的墓主身份地位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广西外藏椁最早见于西汉早期；至西汉中晚期，外藏椁以耳室及墓道底部陪葬坑的形式基本固定下来；东汉初期外藏椁盛行之风走向衰弱，之后消亡。他还认为，使用这一制度者多为诸侯王、列侯及郡守一级的地方官吏^[47]。熊昭明等人指出广西汉墓的外藏椁形制发展到西汉中晚期，有回廊式、耳室形和墓道底部椁坑形三种，后两种在合浦汉墓中有不少发现，在东汉时期消失。这类墓葬的主人应为郡守一级的官吏或贵族阶层，其身份可能为南下的汉人^[48]。

也有学者注意到合浦汉墓的一些其他葬俗。对于岭南汉墓中开口常见的柱洞，郑君雷按性质和功用划分为“封门排柱”“椁盖顶柱”“椁板壁柱”“棺架立柱”“甬道门柱”“棺椁围柱”和“墓上表木和墓上建筑”等七类，认为合浦文昌塔 M6 和 M8 在墓道底端近墓室处的柱洞，应为甬道门柱；而文昌塔 M5 和罗屋村 M3 墓口的柱洞，似与筑

墓时搭建的临时建筑有关^[49]。其对岭南战国秦汉时期的架棺葬俗还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合浦母猪岭 M4 为架棺，上层为棺室，下层为器物室^[50]。此外，合浦汉墓还发现碎物葬，其中近年来发现的汽齿厂 M9 和 M11 的随葬器物破碎严重，部分器物的残块分置几处，且相距较远，应为入葬时有意打破后放置；第二炮竹厂 M4 出土一面铜镜，仅见一小段外缘。富霞认为，这类墓葬的墓主为汉化越人的可能性较大^[51]。

4. 其他相关研究

一些学者从汉墓资料出发，试图对合浦乃至岭南的秦汉时期的经济、文化、社会、商贸等做初步复原。彭长林^[52]、邓家信^[53]、王元林^[54]、覃主元^[55]、熊昭明^[56]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汉代合浦港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富霞、熊昭明从合浦发现的土墩墓，结合江浙、福建、广东、湖南和越南北部的发现，论述文献记载中从先秦时期开始沿东南沿海的“越人南迁”路线的真实存在，说明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北部湾地区与东南沿海通过海路的密切联系已经存在^[57]；蒋廷瑜就考古发现的铁质农具、种子、农副产品以及与农业相关的陶仓模型等，对包括合浦在内的汉代广西农业做了概述^[58]；洗剑民以岭南为背景，论述了农业、青铜业、冶铁业和商业萌芽等内容^[59]；吕名中亦对岭南的经济发展及特色做了探讨^[60]；富霞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剖析合浦汉墓所体现的多元文化因素，进而推定墓主族属^[61]。

(三) 城址发掘与研究

大浪城址和草鞋村汉城址均为近年发掘，由于城内民居较多和历年遭受破坏，且发掘面积有限，城内布局不甚明了，仅对城址的年代和性质进行初步判断。

1. 大浪城址

大浪城址位于合浦县城东北约 11 千米的石湾镇大浪村古城头村民小组，该城址发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城墙上方有明代墓葬叠压，1981 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年代被暂定为“明以前”。此后，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会同合浦县博物馆成立汉代合浦港课题组，对大浪城址进行调查。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 4 月和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 月，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课题组对城址进行测绘和勘探，并先后两次进行发掘，发掘位置分别位于北城墙、城中央及西门外，发掘面积共约 690 平方米，发现居址和码头遗迹等。出土遗物主要为几何印纹硬陶片，可辨器型有陶罐、匜、釜等，还有少量砾石。判断城址筑造年代不早于西汉中期，性质为西汉中期始设合浦县的治所^[62]。

2. 草鞋村汉城址

草鞋村汉城址位于合浦县廉州镇草鞋村西面，20 世纪 80 年代调查时发现马蹄窑和

馒头窑若干，被界定为“窑址”，并于1993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11月至2012年1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位于遗址西北部的窑址位置开展发掘；2010年5-6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抢救性清理了遗址北部的建筑遗迹。该遗址地层共分为7层，其中汉代遗存分为四期，对应年代分别为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及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发现的遗迹主要有灰坑、圉泥坑、沟、池、房址、水井、礅墩和柱洞等。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和石器，陶器多为建筑材料，主要有筒瓦、板瓦残片、瓦当、砖、算等；生活用具有罐、双系罐、四系罐、案、钵、碗、盆、釜、灯和支座等；生产工具有拍、垫饼、网坠、纺轮等；金属器有铜镞、铜箭镞、铁矛和铁钉；石器有石拍、砺石、石饼、石杵臼、石斧、滑石暖炉、滑石釜和滑石碗。另外还出土木拍、象骨、水晶和铜钱等。报告认为草鞋村遗址应是东汉合浦郡的郡城，且有可能在早一阶段的西汉晚期就已作为郡治^[63]。

二、合浦南越国遗存的辨识

以上合浦发现的汉代遗存，从报告年代来看，双坟墩土墩墓、1987-1988年发掘的文昌塔墓地第一期墓葬和草鞋村汉城址第一期属南越国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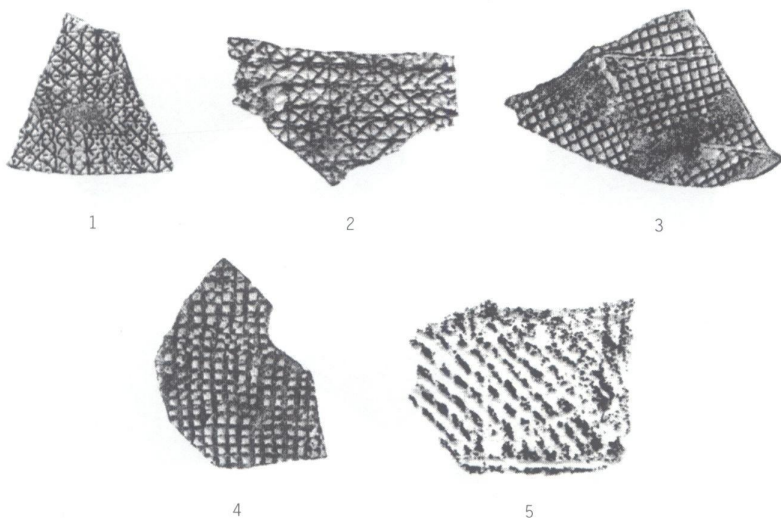
土墩墓是商周时期流行于古代吴越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式，主要分布于今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及皖南部分地区。近年来在浙江北部杭嘉湖地区、湖南北部的沅江下游等地均发现有秦汉时期的土墩墓，修筑风格上延续了先秦的特点。合浦双坟墩土墩墓为岭南地区首次发现的较为明确的土墩墓形制，通过与江浙地区同时期土墩墓形制和出土器物对比研究，双坟墩D2的年代可早至秦—西汉早期，属南越国时期。D的年代报告判断为西汉中期前后，也很可能早至南越国时期。

文昌塔墓地第一期共64座墓葬，其中34座窄土坑墓、30座宽土坑墓，带斜坡墓道仅3座，部分墓葬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结构，以生土二层台居多。长方窄坑墓春秋战国时期在广西开始流行并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较早阶段，而长方宽坑墓大约在战国时期略偏晚阶段出现并流行。如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春秋时期墓葬均为长方窄坑墓^[64]；平乐银山岭战国墓Ⅰ型墓为长方窄坑墓，Ⅱ型墓为长方宽坑墓^[65]；广西贺县发现的西汉早期墓几乎均为长方宽坑墓^[66]。这两类墓葬在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葬中均有发现，分属Ⅰ型和Ⅱ型3式。文昌塔第一期墓葬随葬品数量较少，主要为陶器、铜器及少量铁器。陶器主要是瓮、罐、双耳罐、折肩罐、三足罐、四联罐、五联罐、盒、三足盒、甑、壶、匏壶、提筒、小杯、鼎和釜等，胎质为夹砂陶和泥质陶，少量为青灰色或灰褐色泥质硬陶器。纹饰以方格纹加圆形、方形或其他形态的戳印纹为主。这些陶器器类均为广州汉墓前期常见，器物组合及器型十分相似。

草鞋村汉城址第一期遗存分布于发掘区A区的北部和中部。开口⑦层下，出于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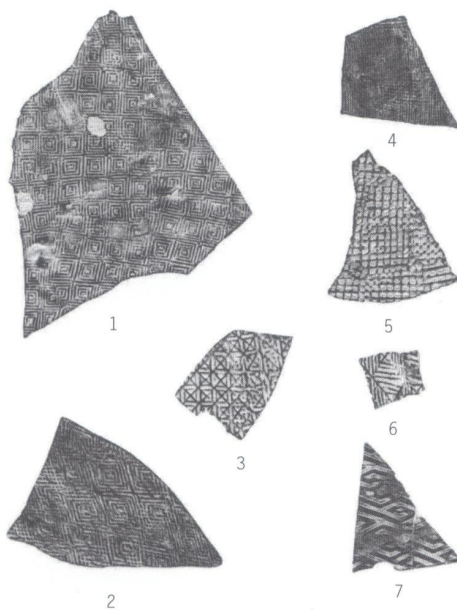
迹保护的需要，大多未经发掘。发现遗迹仅沟和柱洞各1处。地层内出土少量几何印纹硬陶片，其米字纹、方格纹、篦点纹和水波纹等纹饰为岭南西汉早、中期所常见（图3-3）。

被判断为西汉中期前后的大浪城址，其部分遗物可能为南越国时期沿用下来的，“从城址北面发现的土墩墓和附近地表采集的夔纹陶片等来看，城址附近的人群定居时间可能早至秦汉之际，而城的始筑年代也不排除为南越国晚期的可能性，之后延续使用至西汉中期。”^[67]双坟墩土墩墓位于大浪城址北700米处，D2墓葬底部垫土层④层出土的陶片（图3-4）与大浪城址出土及附近地表采集的陶片纹饰相近（图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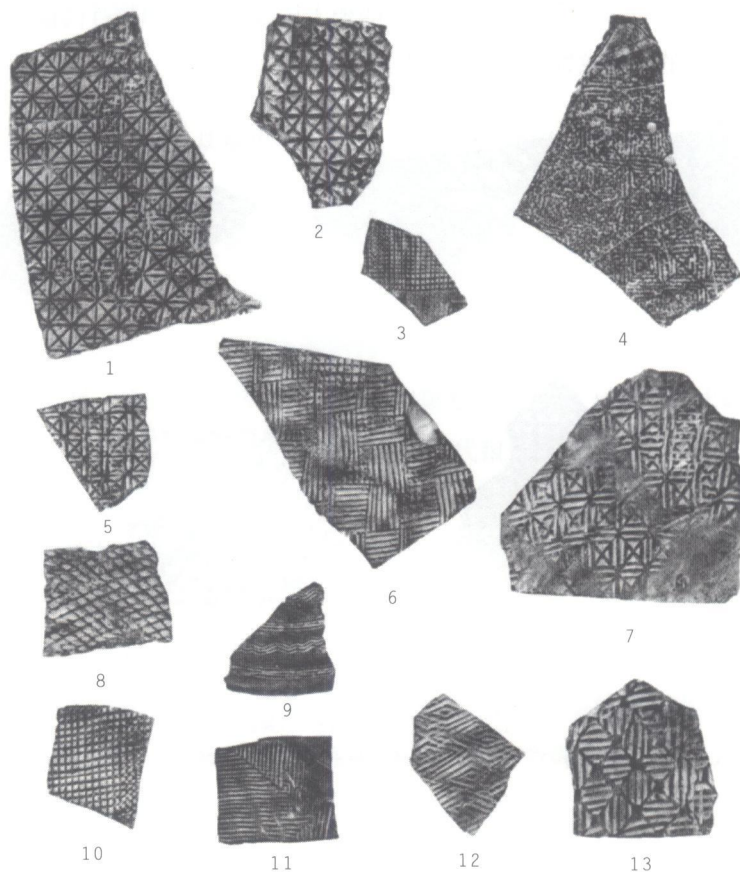
1、2.米字纹 3、4.方格纹 5.绳纹

图 3-3 草鞋村汉城址⑦层出土的陶片纹饰拓片



1.“回”字纹 2.复线菱格纹 3、6.方框对角线纹 4、5.方格纹 7.夔纹

图 3-4 双坟墩土墩墓 D2④层出土的陶片纹饰拓片



1、4、5、7.方框对角线纹(③层) 2.方框对角线纹(采) 3、10.方格纹(③层) 6.席纹加方格纹(采)
8.网格纹(采) 9.水波纹加弦纹(采) 11.席纹(③层) 12.复线菱格纹(采) 13.方框加对角线纹(采)

图 3-5 大浪城址出土及附近地表采集的陶片纹饰拓本

-
- [1] 杨豪:《广东合浦发现东汉砖墓》,《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 [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附录一,科学出版社,2006。
-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46-56页。
-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凸鬼岭清理两座汉墓》,《考古》1986年第9期。
- [6] 蓝日勇:《合浦县廉州炮竹厂西汉晚期墓》,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90页。
- [7] 黄启善:《合浦县风门岭、望牛岭汉墓》,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90-191页。
- [8] 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 [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
- [10]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文物出版社,2017。
- [11] 广西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5期。
- [12] 广西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2期。

-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禁山七星岭东汉墓葬》,《考古》2004年第4期。
-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县凸鬼岭汉墓发掘简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265-285页。
-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第10期。
-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罗屋村古墓葬发掘报告》,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纪念广西考古七十周年专集》,科学出版社,2006,第313-323页。
-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凤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
- [19]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2005年合浦县文昌塔汉墓发掘报告》,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第101-131页。
- [20]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
- [21]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广西合浦寮尾东汉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 [22]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
- [23]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县双坟墩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4期。
- [2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
-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482-491页。
- [26] 富霞:《合浦汉墓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熊昭明、富霞:《合浦汉墓》,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
- [27] 朱海仁:《岭南汉墓仿铜陶礼器的考察》,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博物馆编《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第113-121页。
- [28] 李世佳:《广西汉墓出土陶井明器初探》,《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 [29] 曹劲:《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
- [30] 冯远:《汉代岭南地区陶制建筑明器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 [31] 蒋廷瑜:《汉代镌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8期。
- [32] 熊昭明:《合浦汉墓出土的铜井仓灶》,载香港历史博物馆编《瓯骆汉风:广西古代陶制明器》,2014,第26-33页。
- [33] 富霞:《广西合浦出土汉代青铜器的初步研究》,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0,第372-402页。
- [34] 黄启善:《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考古》1988年第3期;黄启善:《广西发现的汉代玻璃器》,《文物》1992年第9期;干福熹:《古代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玻璃》,《自然杂志》2006年第5期;王俊新、李平、张翼等:《广西合浦堂排西汉古玻璃的铅同位素示踪研究》,《核技术》1994年第8期;王伟昭、熊昭明、李青会、干福熹:《广西合浦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检测和研究》,载干福熹主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205-215页。
- [35]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
- [36] 陈洪波:《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土金珠饰品的考古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 [37] 黄珊、熊昭明、赵春燕:《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出土青绿釉陶壶研究》,《考古》2013年第8期。
- [38] 熊昭明:《广西合浦汉墓出土铜钹略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4。
- [39] Zhaoming Xiong, "The Hepu Han Tombs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f the Han Dynasty", *Antiquity*

88, No. 342 (2014): 1240.

- [40] 熊昭明:《广西汉代出土灯具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 [41] 熊昭明、谢日万:《广西出土的先秦两汉玉器》,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第541-551页。
- [42] 黄展岳:《“朱庐执到”印和“劳邑执割”印——兼论南越国自铸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
- [43] 郑君雷:《汉印与岭南汉代史迹》,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32-243页。
- [44] 蒋廷瑜:《汉代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浅议》,《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 [45] 林强:《岭南汉代夫妻合葬墓有关问题的探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 [46] 林强:《广西汉代厚葬习俗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 [47] 谢广维:《广西汉代“外藏椁”初探》,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纪念广西考古七十周年专集》,科学出版社,2006,第506-518页。
- [48] 熊昭明、谢广维:《广西西汉中晚期墓葬的外藏椁》,载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燕山出版社,2009。
- [49]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四川文物》2010年第4期。
- [50]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考古》2012年第3期。
- [51] 富霞:《合浦汉墓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 [52] 彭长林:《试论汉代合浦港的兴衰与海外贸易的关系》,载潘琦主编《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519-542页。
- [53] 邓家倍:《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广西地方志》2002年第5期;邓家倍:《再论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邓家倍:《合浦与徐闻在海上丝路始发港地位与作用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0期。
- [54] 王元林:《两汉合浦、徐闻与南海丝路的联系》,《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 [55] 覃主元:《汉代合浦港在南海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 [56]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的新进展》,载香港博物馆编《岭南印记:粤港澳考古成果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第130-140页;熊昭明:《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8。
- [57] 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考古》2016年第8期。
- [58] 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 [59] 冼剑民:《秦汉时期的岭南农业》,《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冼剑民:《汉代岭南的青铜业和冶铁业》,《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冼剑民:《汉代岭南的商业萌芽》,《岭南文史》1988年第1期。
- [60] 吕名中:《秦汉时期的岭南经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 [61] 富霞:《广西合浦汉墓主人族属及域外文化因素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4期。
- [62]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大浪古城址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8期;广西文物工作队课题组:《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港的考古学实践与初步认识》,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第39-50页。
- [63]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广西师范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合浦县草鞋村汉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8期。
- [6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鸣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6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 [6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贺县文化局:《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29-45页。
- [67]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8,第31-32页。